

● 作者/Phil Klay ● 譯者/章昌文 ● 審者/黃依歆

美軍征戰的意義與反思

Two Decades of War Have Eroded the Morale of America's Troops

取材/2018年5月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ay/2018)

在歷經十七年的反恐征戰後，美軍固然展現了無比的愛國心，但卻極少有關究竟為何而戰的思辯。本文以戰場中的真實人物為案例，針砭華府政策上之盲點，大聲疾呼軍隊需要明確的任務目標，才能提升真實的士氣。



伊拉克費盧杰(Fallujah)法蘭道(Route Fran)的南邊，數百名叛軍已花上數月時間挖掘戰壕防線、放置路邊炸彈、架設街道路障、訓練使用武器、閱讀《可蘭經》，以及觀看自殺炸彈客影片，目的是為了即將來臨的戰鬥做好準備。法蘭

道的北邊，有第8陸戰團第1營約1,000名的官兵正準備突擊。法蘭道是一條寬闊的四線道公路。2004年11月9日，這條道路因為前一天下過雨而濕漉漉的，天空一片灰濛濛，孕育著不祥之兆。

陸戰隊員貝斯特(Justin Best)後來告訴記者，「你知道整個連隊就要越過這條道路，而且有人將會被擊中。」

在穿越像法蘭道這樣的開放空間時，必須有其他單位進行掩護，且應射擊敵人的所在位置，他們可能從那些地方對你及夥伴們開槍。大部分在戰爭中所消耗的子彈不光只是想殺死敵人而已，還有其他作用，意即當你機動至一個能殺死敵人的地方時，開槍嚇阻對方讓他嚇得頭也不敢抬。然而，在現實中這種方法不見得每次都有效。法蘭道的兩旁都有足夠的大型建築物，陸戰隊員難以兼顧這裡的每一扇窗戶。

陸戰隊員開始穿越道路了，其中一個排全速奔跑，其他排開始交火，子彈在上空漫天飛舞。另一邊的叛軍也開始射擊，其中有人擊中了威爾斯(Lonny

Wells)中士，他是一名四個孩子的29歲父親，子彈射穿了他的腿，他向前仆倒，跌落在地。威爾斯的母親後來回憶道，他小時候就一直夢想加入軍隊。她曾對他說，「你為何不試著去當模特兒？你長得還不錯。」而他回答，「哦，老媽，我要當陸戰隊員。」現在，他面部朝下，倒在費盧杰一條開闊的公路中央，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提供掩護射擊那一排的尚恩(Ryan Shane)三等士官長，放下了他的步槍。身為一名資深領導者，他並不是該去救回威爾斯的人，但他卻開始跑向倒地的陸戰隊員，抓住他防彈背心的吊帶，與另一名陸戰隊員一起開始將他用力拉往安全區域。尚恩才走了幾步，一顆子彈猛然射入他的下背部，使得他也跌坐在地。現在，有兩名傷兵面部朝下倒在開闊的公路中央，他們的血淌在潮濕的路面上。

擔任掩護的每個人都看到威爾斯倒下了，他們也都看到在尚恩試圖幫忙時發生了什麼事，同時非常清楚這兩名傷兵現在是活生生的誘餌，叛軍正在等著射擊任何一個會蠢到去營救夥

每場戰爭都有年輕官兵，不分男女，為了國家拋頭顱、灑熱血。
(Source: USMC/Jesse Stence)



伴的人。當然，陸戰隊員就是陸戰隊員，他們當中又有兩個人跑了出去，而多虧了他們，尚恩得以存活下來。但對威爾斯來說卻太遲了，他因流血過多而死。

以上是常見的戰爭報導。每場戰爭都讓官兵獻身——這些年輕男女身上散發著一種令人著迷的敬畏，冒著生命危險甚至喪失自身性命。渠等是如何、為何這麼做？在美國，我們自有一套獨特的答案。當人們駕車穿越南方，在教堂外偶爾會見到美軍陣亡戰士十字架(Fallen Soldier Battle Cross)旁的耶穌像標示和一段文字：渠等都是為了你的自由而死。雷根總統曾拿作家米契納(James Michener)有關韓戰英雄的問題提問——「我們到哪去找這樣的人？」——而且只能這樣回答，「這個嘛，我們在一向能在他們的地方找到他們，這些人是世上最自由社會下的產物。」

由此看來，這是種民主勇氣，是我們社會本質和屬性最單純的反映。在火線下衝出去的那些人，是由我們的公民主體所組成，孕育於美國民主制度下對自由的熱愛、穩固的公民制度，以及光榮的歷史。那些人會以華盛頓總統口中「自由人」的身分奮戰，而非以「僱工和傭兵」的角色參與。

相對地，身為他們所屬主體的成員，我們受到這些典範鼓舞，承諾投以同等熱情去維繫美國公民社會，這也將持續激勵此等勇氣。當林肯總統站在蓋茨堡(Gettysburg)時，其宣稱美國民主動力已死，敦促國家再度「以更大熱誠，致力於曾毫無保留獻身的志業。」當威爾遜總統站在法國敘雷訥(Suresnes)的美國公墓時，其闡明所稱「殉亡者

心照不宣的委託書」時，也提及相同的動力。

戰鬥的袍澤情誼常會被運用於政治目標上，但當美國處於十七年的戰爭中，這些目標變得更小，事實上已幾乎微不足道。2017年2月，川普在國會演說中向一名陣亡海豹小組隊員的遺孀致敬，他並沒有闡明美國理想的願景，或勾勒美國在國際間更遠大的道德目標，卻只是在為其主張辯護，解釋導致該名隊員喪生的突襲是一場成功的行動，而其中所產生的情報能在無止境的反恐戰爭中掌握更多敵方資訊。總統和遺孀都獲得了如雷的喝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一名政治評論員說，「在那一刻川普真的成了美國總統」，認為他利用悲傷的寡婦引發「凝聚力」。果然，這名陣亡海豹小組隊員的鮮血經證明只是稀釋了的膠水，比短暫迴響在國會大廈中的兩黨喝采聲稍微持久一點而已。

1812年美國遭逢首次重大軍事挫折的戰爭前夕，某雜誌表示「戰爭將會淨化政治的氛圍，所有的公共道德都將完善並受到尊崇；而美國將再次看到，總領政務的公民可與1776年的不朽人物相媲美。」但在連年烽火的時代，往往事與願違。雖然目前軍方享有極高的滿意度——72%的美國人表達對其「極具」或「相當有」信心——但幾乎有關美國人民生活的其他重要機構都不及格：國會滿意度僅12%、報紙是27%、最高法院是40%、宗教組織為41%，同時27%的民主黨員和36%的共和黨員互視彼此為敵對政黨且為國家威脅。

如果戰鬥中年輕男女的勇氣真的與美國公民社會的本質和品質有關，那就不得不憂心了。吾人會看到，病態從公眾生活散布至甘心為這個分

裂國家冒著生命危險的青年男女心中。而進一步仔細觀察，會發現事實正是如此：在運動賽

事、退伍軍人節慶典，以及國會殿堂中所有對美軍所展現的儀式性支持，是種無藥可醫的病



1995年奧克拉荷馬市炸彈攻擊事件後，沒人料到兇手並非一開始大家認定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反而是自詡愛國主義者與波灣戰爭英雄的本土炸彈客。(Source: Flickr/Mark Burkholder)

態。這樣致敬方式並不了解所謂「毫無保留獻身」的實際意涵，或為了維繫它可能的需求。戰鬥中的袍澤情誼，會比我們崇高修辭所能表達的要複雜得多，且可能更為脆弱。

1999年，迪可(Maurice Emerson Decaul)與一名三K黨成員準備到海外部署，他是一名陸戰隊砲兵連的黑人上兵。由於軍事單位是美國社會的縮影，他可能會與各式各樣的美國人共事——來自北維吉尼亞郊區與新墨西哥州小鎮的西班牙裔小孩，以及印第安納州鄉下越南難民的下一代。更令人訝異的是，來自西維吉尼亞州、三K黨家庭的孩子，居然在其陸戰隊制服中夾帶了一件白袍與頭套，出現在該砲兵連營舍。筆者將用「J」來稱呼他。

如果迪可想要——或該單位任何一個人希望——就能將J趕出陸戰隊。陸戰隊並不包容仇恨團體，該軍種常針對如何認出幫派和仇恨團體人士身上刺青進行開課，來幫助軍官辨識與汰除相關成員。在2017年維吉尼亞州沙洛斯維(Charlottesville)新納粹人士遊行後，陸

戰隊司令納勒(Robert B. Neller)上將在推特發文譴責種族仇恨和極端主義，同時響應一項追溯到1980年代的政策。1995年，波斯灣戰爭退伍軍人麥克維(Timothy McVeigh)以炸彈攻擊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的默拉聯邦大樓(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後，該政策甚至更積極地推動。就軍方而言，像J這樣的人不只會破壞單位團結和部隊的道德品格，他們甚至是國內的恐怖威脅。如果有人通報指揮鏈，甚或在單位法務單位留下匿名訊息，該單位就會開啟調查，而全案就會自然發展。一名軍方律師告訴筆者，這樣的事再清楚不過了。但事實往往不是如此。

J的陸戰隊同袍僅在部署前的準備訓練時觀察他，即使那是在911事件之前，但仍有可能會發生戰爭。單位繼續其預劃的部署，最終繞道經過了巴爾幹半島。領導階層對迪可單位可能要倚賴自身多種族的陸戰隊員保命而留下深刻印象，這意味著迪可和其他黑人、西班牙人、亞洲人及猶太孩子可能都還要仰賴三K黨人，而非只是逐日自問「我能相信辦公室的這個傢伙嗎？」當一名部署的陸戰隊員看著他的袍澤時，眼前的問題很清楚：如果筆者像威爾斯中士、尚恩士官長一樣，在輕武器砲火猛烈掃射下，倒在一條開闊公路中央即將失血而死，別人會跑出來救我嗎？

這或許看來會對J期望過高，但迪可並不十分在意。他告訴筆者，「我從不認為在戰鬥中不能信任J」，迪可顯得也有一點被自己的話嚇到，「我從不覺得J不了解他的工作，在訓練中，你會知道能相信誰。你會看到畏縮的傢伙，而這麼說吧，他並不是那種人。」

在陸戰隊中，J並非是迪可唯一遇到種族主義問題的人。某次山地訓練期間——迪可告訴筆者那是一次有名的艱苦體驗，比他在伊拉克時更嚴苛——他必須照料火力組內一名得了高山症的上兵。由於迪可是這傢伙的直屬士官，他得幫著這名陸戰隊員緩慢且痛苦的走下山。走到半路，他們停下來休息，這名年輕陸戰隊員或許是為了要緩和表達對其長官感激的尷尬感，便開始和迪可談起了他的家庭，以及他從小被教育的種族主義。這並非致歉，它少了某些東西——一種坦率，沒有那種在這類時刻可能會產生道德頓悟的片刻真誠。他沒有要為種族歧視和解，也不祈求原諒其家庭否定迪可認為基本平等存在的這段過去。迪可傾聽著上兵的訴說，這位弟兄是他的陸戰隊員和他的責任，然後他們繼續走下山。

身為美國的黑人，迪可能夠預料得到，作為國家組織一員，不論身在陸戰隊或任何其他單位，都要與過去世代以私刑處死、折磨過像他這樣的人一起努力工作。這並不公正，但以實用主義來看，這在軍隊成員中極其普遍，他接受這點並盡忠職守，而他是以工作的情境來看待其單位與J的關係。

就在砲兵連部署之前，連隊成員舉辦了一個規模盛大的營區派對。對那些從未去過營區派對，或當值要負責處理隨後混亂的軍官來說，這是一個幾乎沒有女人，甚至連兄弟會都稱不上的派對。迪可告訴筆者，「我們才19歲；有種感覺我們可能會死，所以管他的，找些樂子，忘記一切不快吧。」

某士官開始宣稱他是蝙蝠俠，當陸戰隊同袍說

他在胡扯時，士官為了證明酸他的人錯了，決定從營舍三樓跳下去。他摔斷了兩條腿，顯然他不是蝙蝠俠。另一名陸戰隊上兵，高速酒駕撞向另一座營舍。但最讓迪可對那一夜印象深刻的，是看到J穿著三K黨的服飾，包括頭罩和其他全套裝束，出現在營舍之間的狹小通道內。

另一名黑人陸戰隊員直線衝向這名西維吉尼亞三K黨員，每個人都在看，想知道一個黑人陸戰隊員和美國白人至上論者的對峙會發生什麼事。他與J正面相對，直視其雙眼說，「嗨，讓我穿穿你的三K黨裝吧。」J脫下了他的白袍和頭套，將它們交給了這名黑人陸戰隊員，後者將這套服裝穿上身在派對中四處走動，接著與大家擊掌慶祝、開心笑鬧。

迪可目前拿到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編劇獎學金，他告訴筆者在那裡發生的種族對話跟在陸戰隊裡非常不一樣。回想起來，他說，「包括我在內，沒人覺得受到冒犯，每個人都認為那很可笑。」派對持續進行，而之後的部署也一切如常。迪可最後一次有J的消息是最近的事，他收到臉書通知說J想加他好友，「迪可說我拒絕了他，他心想，J，我受夠你了。」

考慮到陸戰隊的年輕人；以及實際上單位的兵力結構以美國黑人為主；還有與黑人激進主義相較，美國人較容易接受白人激進主義；而當提到危險、犯罪和黑色幽默時，陸戰隊員被稱為像是飛蛾撲火；以上種種原因，都令人很難相信迪可宣稱那沒冒犯到任何人。畢竟，一切還是有限度的，而他們或許險些要接納美國歷史上最殘暴的國內恐怖組織了。



美國首位黑人四星上將小詹姆斯，其服役期間曾參與韓戰及越戰。(Source: Wiki)

有時候陸戰隊員——不只白人，就連有色人種也一樣——喜歡將軍隊描繪成一個「色盲」機構，在其中人是以能力和特質來評斷，而不是依照種族或背景。首位黑人四星上將小詹姆斯(Daniel "Chappie" James Jr.)曾說過，「陸戰隊沒有任何種族問題，他們把每個人都當黑人看待。」但這並非實情。加入陸戰隊的美國人，帶著他們承襲至美國社會的偏見而來。筆者聽過軍中一些誇張的事。有一次，演習中受訓陸戰隊員穿越CS催淚性毒氣室，整個部隊都已到了室外，淚流滿臉、鼻子上掛著長長的鼻涕，皮膚灼熱。此時一名士官教

官走到部隊其中一人面前說道，「嘿，候補人員！你是猶太人，對吧？」他指著毒氣室並說，「你應該再進去一次，因為你已經習慣了。」但無論新的陸戰隊員帶著怎樣的偏見進入陸戰隊，也都透過強有力的群體認同得到過濾，因此改變人們互動的方式及渠等價值觀之輪廓。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針對是否准許同性戀者服役的論辯，在「不要問、不去說」的政策實施前，蘭德公司就研究過允許同性戀者進入軍中對單位戰備的影響。反對同性戀者服役的論述認為，一般軍人對同性戀者相當反感，已到了會傷害士氣的程度，會限制戰鬥單位過去賴以運作的袍澤之情，且通常使軍人在服役的親密環境中感到不自在。但這份1993年發布的蘭德報告，卻一面倒的論斷說這不會是問題，其實主要原因並不在於蘭德未在軍中發現極端恐同症的證據。筆者可以向大家保證，即使那份報告公布十年過後，也就是在我進入軍中時，這樣的感受依然很強烈。蘭德認為不要緊的原因在於人際吸引力——正常狀態下某人擁有的特質會使你想在工作之外與他們相處——對單位效能並無確切影響。事實上，高度的社會凝聚將使個人的優先事項從組織轉移到社會，因此有可能會損害單位的效能。相反地，最重要的因素是對一項任務的共同承諾，強調團結一致——而非性別與種族的差異——以及任務的重要性，才是關鍵因素。

這是袍澤之情而不是友誼的原因，是因為你可以與兄弟們奮戰終日還願意為他們捨命。」並非迪可單位裡唯一行為怪異的人，迪可的室友對酒精和烈性毒品重度成癮。迪可告訴筆者，「我們

幾乎都在打架，我說的可是揮拳鬥毆。」但這個室友的同儕照樣沒拋棄他，因為上了戰場，這個傢伙對火砲操作相當厲害。吸毒者和三K黨員——都應該被趕出去的成員——在陸戰隊同袍眼中是對單位有貢獻、對眼前任務有用處的軍人。

當威脅存在時，你對他人重視的特質是會轉變的。儘管可能面臨生死交關，但像迪可這樣的陸戰隊員並不願與三K黨員和吸毒成癮者為伍；他們會願意與這些人共事，是因為這一刻命在旦夕。套句陸戰隊的俗話，「你可以將性命託付給一名陸戰隊員，但絕不是你的錢或你的妻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情報官的哲學家葛雷(J. Glenn Gray)用此區分友誼和袍澤情誼的不同。友誼是具有真實情感和智識上的吸引關係——人們不會失去身分，而是「在彼此中找到自我，並因此獲得更多的自我知識和泰然自若。」相反的，袍澤情誼關乎融入團體。曾為蘇聯紅軍報紙報導史達林格勒戰役(Battle of Stalingrad)的俄國作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其認為融入是戰場成功的關鍵因素。他寫道，在戰役中，「我是我們，我是一群要開始攻擊的步兵，我是支援的戰車和火砲，我是點亮吾人共同大業的火焰。」懂得如何去掌控以下轉變，從「柔弱、膽怯的『我』」到「英勇、聰慧的『我們』」，是格羅斯曼所認定「連和營成功夜襲的鎖鑰，以及全軍和人民之軍事成敗的關鍵。」

這些感覺雖然短暫——葛雷後來提到二戰老兵們重聚的尷尬，要燃起老袍澤間的感觸，僅有靠極大的力氣和酒精才能辦到——但卻深入而強烈。對許多人來說，它們是極其一生中最強烈與

純粹的體驗。你何時環顧房間裡30個男女的一群人，想著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為你捨命？

這就表示當談及讓一個軍事單位發揮效能時，我們不只是在談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談的是得到袍澤情誼衍生獨特之愛的機會，這份愛能存在於正常狀況下無條件相愛的人之間，這些人甚至可能根本不值得如此的愛。或許正如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說，這是「殘酷的團結」，但儘管如此仍是一種團結。而這樣的事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要感謝軍人無私的特質，甘受艱苦的訓練並誓言不丟下任何夥伴。而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對單位之外某些事情的承諾，他們需要一項任務，一個可達到、合乎道德，以及符合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及制服上所配帶國旗價值觀的任務。

長期而言，軍隊的兵力與合法性，被人認為是其兵力與合法性計畫的運作情形。在戰鬥中，凝聚官兵核心目標的明確性，無法單純由軍隊本身表現，而且在美國目前的氛圍中，已歷經十五年在多個大陸的不同戰爭，對這種明確性的期望已經腐敗了。

當筆者離開陸戰隊時，還是個對任務深信不疑的人，且也有理由這麼做。我曾駕車通過法蘭道，經過威爾斯喪命之處，經過許多其他陸戰隊員死亡、失去四肢，或是燒得面目全非的地方。法蘭道過去常是死亡和暴力的發生地，滿是路邊炸彈、狙擊手攻擊及伏襲行動。但我當時在法蘭道並不需要太勇敢，因為那時是在「財富行動」(Operation Alljah)之後，該場行動清除了大部分費盧杰的叛軍，並與當地部落合作設置了聯合安全站。當我們駕車經過一堆瓦礫、布滿彈孔的建築，以

及騎著腳踏車的伊拉克孩子時，我們看到了令人驚訝的東西，一名陸戰隊員說，「天啊！那個……那是一家婚紗店嗎？」

那真的是一家新開的婚紗店，就座落在法蘭道邊上。我們無法置信，另一個陸戰隊員感嘆道，「法蘭道上的婚紗店，我的天哪！」

這是增兵政策大肆宣揚的部分「成就」：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決定增加在伊拉克的駐軍，以及裴卓斯(David Petraeus)上將致力以2006年新戡亂野戰教範為基礎戰略下之決策。學者和戰略家依舊在爭論，該政策轉變對該年暴力事件戲劇性下降的影響程度，但對我們這些實際在戰場上的人來說，其中的關聯只是假設而已。

同時，國內有關軍事政策的激烈辯論正在進行，當裴卓斯和駐伊拉克大使克羅克(Ryan Crocker)在2007年9月到國會進行聽證時，反戰團體「繼續前進」(MoveOn.org)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全版廣告，質疑裴卓斯為「背叛美軍官兵的將軍」，並指他在替「白宮杜撰故事」。時任紐約州參議員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告訴裴卓斯和克羅克，渠等報告要能「讓議員願意放下懷疑」才行得通；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表明，他們提出的計畫聽來像是「至少十年無限度駐軍和戰爭的承諾」；而當共和黨參議員華納(John W. Warner)問及對伊拉克的戰略是否已讓美國更安全時，裴卓斯告訴他，「先生，事實上我並不知道。」兩天後，小布希總統在電視發表演說，探討他所見在伊拉克的進展，並說明他持續軍事承諾的理由。

鷹派有時會試圖將這樣的辯論詆毀為對官兵

的侮辱。前陸戰隊員、現任美國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F. Kelly)上將在一次演說中宣稱，軍人「忍著不去鄙視那些自稱支持他們的大眾，因為這些人畢竟不是奪走他們純真、肢體，甚至生命的罪魁禍首。」回顧過往，筆者發現公共辯論的唇槍舌劍，在形成自己對所認為的目標和成功應為何物的見解上影響很大。身為一名2007年在伊拉克安巴爾省(Anbar)部署的陸戰隊員，筆者能夠打開電視，看到各種在伊拉克的成功指標於國會中辯論——安全、政治和解、外交接觸、經濟及基本生活設施。小布希政府提出聲明，受到攻擊後加以辯解，又再次提出。反方論點——增兵的獲益言過其實，且在沒有美軍大規模駐軍下，不太可能達成範圍更廣，並確保伊拉克長期穩定的政治折衷方案——也得到相同對待。不論是贊成或反對的熱烈爭論，都明確顯示了政策與美國駐軍相當重要。

2008年筆者從伊拉克返國，不到一年，陸戰隊就在阿富汗增兵。歐巴馬總統宣布大量在當地增兵時，我們感覺好像被召喚去重現伊拉克的「奇蹟」，而突然間我周遭的陸戰隊員們紛紛被徵召部署。安巴爾省實在太安全、太無聊了。如果是在阿富汗作戰，倒楣程度就像被雷劈中兩次一樣，但願戡亂理論真的能發揮效果。我曾在野外演習期間詢問一名年輕上兵，抵達赫爾曼德省(Helmand)後，他的單位要如何圓滿達成任務。我原本期望的答案是像「計畫殺死我們碰上的每個人」，他卻告訴我他們將藉由「文化的效能」獲得成功，這當時是從營長宣達至連長、排長、排附、班長的語言。那曾是多麼有希望的理想。

筆者沒有選擇留下和部署，而是離開陸戰隊去讀研究所。第一年在紐約的舒適生活期間，我得知一名認識的陸戰隊員死於路邊引爆的炸彈。他是透過我引薦給部署單位的上尉後，志願前往阿富汗的。我還獲悉一名曾密切共事的陸戰隊員受到應急爆炸裝置(IED)襲擊，遭彈片打中眼睛而導致半盲。我搭公車到華特里德(Walter Reed)國家軍事醫學中心去看他，只不過在抵達前數小時，他就已轉送到美國西岸了。他恢復得不錯，仍留在陸戰隊，現在是名三等士官長，有隻以陸戰隊的老鷹、地球與船錨徽章當瞳孔的假眼。

伊拉克正在崩解，而阿富汗也沒顯示出有多大進展的跡象。2010年和2011年在赫爾曼德省征戰的一個陸戰隊營，蒙受的損失比過去十年任何一個陸戰隊營更多。當隨軍記者問起這樣的犧牲所謂何來時，該營士官最能激勵人心的回答就是：「這場戰爭蠢斃了，但又能如何？我們國家已深陷其中了。」

在這段期間駐紮阿富汗北部的一位陸軍友人，寫信回家道，「想像所有一切會有終局毫無意義，因為本就沒有——反正不能透過暴力就是了。」次年，也就是2012年，筆者收到一位好友的電子郵件，描述他所派遣之處的偏遠情況；那裡沒有他在伊拉克所習慣的舒適、較好的食物、更可靠的補給；而他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對付暴力，而是「令人心煩的不明確環境，加上不斷改變的模糊任務。」阿富汗的陸戰隊員開始說有關敵人的笑話：「我們有手錶，但他們有時間。」

於此同時，那些陸戰隊員選出的領導者，卻盡一切可能規避能闡明那些任務執行的公眾討論。

在特戰人員和顧問重新進入伊拉克時，歐巴馬政府一再堅稱這些部隊不能算是「派駐當地的軍隊」(boots on the ground)，引得一些老兵訕笑，說那些特戰人員一定穿的是「戰鬥拖鞋」(combat slippers)。2015年7月，歐巴馬總統在一場募款活動中吹噓說，「我們結束了兩場戰爭。」難怪我們的官兵會分不清他們為何而戰，他們的統帥甚至連自己都不承認仍處於交戰狀態。

在川普政府時代此種矛盾更加嚴重。為確保擊敗如伊斯蘭國等敵人以取得長期的穩定，並壓制新恐怖團體對美國利益之威脅，軍隊必須前後一致地闡述跨政府合作的願景，這指的是國防部、情報體系、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以及其他能提供人道援助和開發專業等部門的合作。前國防部部長蓋茨(Robert M. Gates)認為，「沒有了開發，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不會成功。」即使連川普任期甚短的國安顧問、前陸軍佛林(Michael Flynn)中將都曾一度呼籲執行「中東的馬歇爾計畫」，但川普政府對這樣的協調和規劃既無本事亦不感興趣。2016年，筆者曾有機會在電視播出的退伍軍人論壇上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川普提問，我問他有關伊斯蘭國垮臺後的計畫，但除了美國應該「拿下石油」那令人費解的建議外，他並無明確的回答。

如果要說區別，那麼不意外地，相較於歐巴馬時代，目前軍方領導階層更堅持非國防部支援的必要性。美國防部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持續倡議外交的重要性。他在2013年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時對國會說過一段名言：若要刪減國務院的資金，「我就需要買更多的彈藥。」現任中央司令部

司令沃特爾(Joseph L. Votel)上將說過，「這裡有一大堆事軍方能做，但在此過程中，美國的外交官、國務院，以及其他發展機構和相關單位的參與也極為重要」，因為美國若不能整合軍事目標與軟實力，就有可能處於幫敵人達成其戰略目標的風險中。」

為了回應國防部強力要求當局應資助美國在非軍事方面的力量，川普政府提出的2019年預算，係以2017年為基準刪減國務院、國際開發總署26%的經費，並降低20%財政部國際計畫之預算。在前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領導下，國務院逐漸流失近12%的外交政策專家；有數十個仍未補足的高階職務；以及數個離退外交官員告知媒體未曾看過國務院士氣如此低落的情形。2017年夏天，川普針對阿富汗政策的演說中曾宣稱，「美國新戰略的基本支柱，是去整合美國國力的所有工具——外交、經濟及軍事——以獲取勝利果實」，而且那些「美國人民的勇敢捍衛者，將會得到所需的工具和接戰規定，使該戰略能發揮效果，」但他的政府卻鮮少供應自身軍隊領導人認為對任務極其關鍵的工具。

欠缺美國所有國力的真正整合，美國近期的軍事成功極可能離自身而去，不會比在伊拉克戰勝蓋達組織之後更好。歐巴馬政府認為任務已完成，在有了那些成功之後，就限制與伊拉克的外交交往、規劃急遽削減民間計畫，並大幅減少經濟援助。幾年過後，美國就面臨了新威脅崛起，即伊斯蘭國。當美國創造了真空，就會自動有東西填補。美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納塔利(Denise Natali)曾指出，在摩蘇爾對抗伊斯蘭國獲勝後，由伊

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支持的民兵，填補了巴格達和國際社會留下的一些軍職空缺，不僅設法招募什葉派穆斯林，甚至還包含遜尼派人士。換句話說，單純藉由強調目前政府鄙視的那種軟實力，伊朗支持的民兵正設法將美國和伊拉克的戰術成就，轉換成伊朗的戰略勝利。

於此同時，川普政府正在擴展葉門、巴基斯坦和索馬利亞的致命性反恐行動，其為歐巴馬任期最後六個月相關行動量的五倍以上。但反恐突襲的一輪猛攻並不能成為政策，2014至2016年間領導特種作戰司令部的沃特爾上將曾指出，「美軍幹這件事很久了，知道有很多恐怖分子領導人被殲滅，我們還殺了他們許多人，然而總會有人隨時準備接替這些職務。」在國家安全界的人士有時會將這類突襲稱做「割草」，這讓我們想起古老的步兵謎語，「什麼使草生長？」答案是：血。

有人會認為，將近十七年的戰爭，應該會教會美國人民及其選出的領導人，一套只專注運用軍事力量，卻缺乏更通盤結果考量的戰略有其侷限性。

但實際上，美國正反其道而行。現在我們有個想要發動戰爭，卻對執行自身軍事領導者堅持的重要作為絲毫不感興趣的政府。2018年6月，國防部長馬提斯坦率告訴國會這件軍隊知曉多年的事：「此刻美國並未在阿富汗獲勝。」當然沒有，我們並不想贏，只不過想拿取戰利品罷了。

「陸戰隊中嚴厲的愛，是筆者何以如此深愛陸戰隊的原因，這是我唯一曾愛過的單位。雖是嚴厲的愛，但還真的不錯。」

麥斯威爾(Maxwell)三等士官長在班的寢室中踱著步，所有的年輕候補軍官立正站著等候例行檢查。當時時間是在2004年，美國正在打兩場戰爭，分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我們成了陸戰隊軍官，就可能會前往兩處其中一地。希望是伊拉克，因為阿富汗看來沒什麼太多事要做，但在這之前，我們得先通過麥斯威爾士官長的例行檢查。

他說過，「在陸戰隊你們將會遇到許多沒教好的孩子，他們來自不好的家庭，從來沒人

愛。必須給他們嚴厲的愛，這也是為何對你們這麼嚴格的原因。」

麥斯威爾士官長相當高大，記憶中因為他總是在候補軍官



在陸戰隊將會遇到許多沒教好的孩子，他們來自不好的家庭，從來沒人愛，陸戰隊必須給他們嚴厲的愛，這也是為何對你們如此嚴格的原因。

(Source: USMC/Rodion Zabolotniy)

學校折磨你，所以總會將他高估個幾吋，但他絕對比一般人要高得多。筆者身高6呎1吋(約185公分)，而當我立正站在他面前時，我的眼睛還不太能看得到他的下巴。

除了體型之外，他還有種看起來天生的、其他

多數士官教官所沒有的強烈個性。麥斯威爾熱愛陸戰隊，他曾告訴我們，「陸戰隊真他媽的是全世界最棒的作戰部隊，不！是宇宙最好的作戰部隊。因為若有該死的外星人過來，想搞死我們，我們也會給他們好看。」他希望我們為衝突做好準



備，無論我們的敵人是蓋達組織、外星生物、或是「天殺的左傾紅色共產主義渾蛋民主黨員。」

即使對班寢室內的左傾民主黨員來說，這也是個具吸引力的簡單觀點：讓我們瞄準敵人。悲哀的是，我們在接下來十五年才會結束這場仗，比起好萊塢一般的外星人入侵還更晦暗，道德上更不正當。2014年6月時，西點軍校畢業生魏爾曼(Fred Wellman)聽到自己在2003年4月曾造訪的一個伊拉克小鎮發生屠殺後(後來證實是假報導)，他上推特抒發情緒。他開始列出曾與其共事過、遭到暴力傷害的人：2004年，一名傳譯在影片中被砍頭；2006年，一名醫生遭炸傷失去雙腿後，就只能回到魏爾曼幫忙建立的診所去工作，但在美軍撤出後該醫生於2011年在當地遭民兵殺害。當時魏爾曼寫道：

「到此時，在我三次輪調期間，幾乎每個曾共事過的伊拉克人都遭到殺害……如果有人知道我應該如何自處，我會傾聽，但現在我只對戰爭的殘酷感到震驚。我希望出現自稱帶種的領導人，因為他們派了像我一樣的人到戰火之中，只會像我一樣感受到數十人死亡的重負。」

魏爾曼稍後會知道真相——並無屠殺這件事，只是四名伊拉克安全部隊人員，在一個曾被伊斯蘭國占領過的小鎮遭到殺害。這就是所謂的佳音吧。

然而面對服役生涯，魏爾曼始終抱持著典型務實的軍隊作法，這期間長達二十二年、歷經多場戰爭及兩個政黨的總統。當川普的支持者最近質疑有關伊拉克戰爭何以值得犧牲成本與美國人的生命時，魏爾曼回應道，「身為一名老兵，我不

會去贊成或反對我打的戰爭。我奉命前往，我去了；我的孩子接到命令，他也去了。」

這足以維持一支軍隊嗎？對一個不願認真解決因處置失當而造成戰爭磨難的國家，會有剛毅的責任感嗎？麥斯威爾士官長對於戰場成功的觀點，在美國干涉的十年中已經過時，而美國雖仍持續產出像麥斯威爾這類人物，但當戰爭重擔只由某些人承擔時，士氣將會難以維繫。

筆者經常聽到老兵們希望徵兵，希望能使更多美國人進入這個環繞黑暗星球的軌道，無非希望國家持續使用軍事武力。共和國的創建者原本希望迫使國會每兩年表決一次，只為了保留一支常備陸軍；如今國會甚至不允許投票更新伊拉克戰爭前通過的《作戰授權法》(Authorization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而我們目前卻以該法案依據對付在立法時還不存在的叛亂團體，且未能與時俱進的進行修法。

對尋求解釋為何要他們冒生命危險的海外軍人們來說，這項議題既無公開辯論，也沒有像2007年一樣，不斷有清楚的成功指標在國會和電視上進行研究與分析，甚至沒有三軍統帥的明確指導。總統某個月在阿富汗開始派兵以升高衝突，宣稱是為了向塔利班施加軍事壓力，促使他們參與政治協議；幾個月過後，他又宣布無意談判，且「未見到任何會談進行。」當似乎沒有任何人——一般民眾、被選出代表他們的國會，或是三軍統帥本人——認真看待軍人在打的仗時，我們還能保有使命感嗎？

軍隊是美國立國宗旨的主要部分；它是鞏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力量。身為美國人，就意味著無

論好壞都與此密不可分。但正如魏爾曼關於戰爭的回答，美國當前困境的解決之道，不在於軍隊本身，軍隊不能自訂目標、無法決定自身預算、為何種理想戰鬥或捨命，也不能決定其付出是否會受到表揚、蒙受羞辱，或遭人據為己有。因此儘管全美國選擇以感傷、無實質的表現，來表達其對軍隊的愛，但我們軍隊仍在等待前後一致的國家政策，認真看待國家的戰爭。儘管可能無望。

這件事看來會是如何？它可能是廢止無期限的《作戰授權法》，並要總統經常向國會說明，在哪裡及為何他要將部隊置於險境、任務需要何種資源，以及成功的條件為何。這也可能是每位國會議員善盡憲法賦予的責任，藉由對計畫的辯論然後投票，提供對美國軍事行動的監督，這會看來像是一般美國人都參與了那樣的討論，並鄙視任何試圖告訴他們無法做到的人。這會像是儘管

美國部隊在海外冒生命危險，我們領導人卻說美國並未處於交戰狀態，或是主張美國人若欲支持部隊，就必須支持國家正在進行的戰爭，抑或當一名新聞發言人認為若有任何人質疑軍事突襲的成功性與否，就該對戰亡者「表示歉意」時，一般美國人會厭惡地翻著白眼。那會像是我們的政治人物，讓陣亡者得以安息，而不是抬起他們屍體當作政治掩護。而當軍人在海外非預期之處死亡時(如2017年有四人在非洲尼日[Niger]被殺)，那會像是我們刻意迴避以下這種簡單且具象徵性的辯論：我們總統是否輕視軍隊，因而未隆重弔唁；或者是否自由派不尊重軍隊，為政治利益炒作那些有失隆重的弔唁。那會像是我們反而有了較久而深入的對話，針對軍人執行任務應有的表現，和是否我們只是在賞臉給軍人以確認這可以實現。

當一個國家無法將戰爭視為集體責任，卻變成少數人為自己選擇的任務時，戰鬥中的袍澤關係，以及軍人與公民間關係將是如何？(Source: US Army/James K. McCann)



簡言之，這會像是全美國人大幅減少施捨官兵更廉價、感傷之愛，而加倍給予一些更接近麥斯威爾士官長的「嚴厲之愛」——要將注意力集中在美國過錯和失敗上的一種愛。

如果我們不做，那麼到某個時刻底線將會崩盤。士氣是件難以測量的事，但有許多指標顯示它已在下滑，2009年《軍事時報》(*Military Times*)一份調查顯示，當伊拉克的暴力下降，且對阿富汗的新戰略依舊可維持勝利承諾時，91%的官兵認為他們的生活品質是「好」或「極好」；但到2014年該數字已下降到56%，加上志願留營率的意願從72%跌到63%，新兵徵募也在減少。過去三十年，軍隊通常會接受約60%的申請者，近年該數字接近70%，並持續上升中。而且現役部隊已筋疲力竭。當筆者服役時，遇到軍職生涯中部署五次的人就已印象深刻了，現在我遇到的人都已經去了八次、九次，甚至十次。在特種作戰圈中，這種情況尤其嚴重，2017年特種作戰司令部部署部隊到149個國家；有些戰士以湯瑪斯(Raymond Thomas)上將所稱「令人受不了」的六個月海外、六個月本土的步調，輪番進出部署。我最近遇到一名曾部署過七次的陸軍突擊隊員，他在執行美國本土勤務，並告訴我當他及妻子得知他可連續兩年待在國內時，反應都相當激動。他們彼此相愛，還有三個孩子，但從未有過完整的兩年在一起，且其中一人還不用赴海外部署，夫復何求，尤其是當無休止的戰爭仍在繼續。掌管國土防衛與全球安全的首席副助理國防部長蕙蘭(Theresa Whelan)近期告訴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特種作戰圈必須「吃掉自己的年輕官兵

……(並)抵押我們的未來」才能繼續下去。

日復一日，那樣的抵押未來已日漸逼近，當日子到來時，誰會為了模糊且無望的任務志願從軍？要如何激勵人們為許多人都不相信、連目標都無法闡明的大業而參戰犧牲？當我們無法像一個國家將戰爭視為集體責任，而非少數人為自己選擇的特別任務時，戰鬥中的袍澤間關係，以及軍人與公民間關係將是如何呢？

缺少能闡述與論辯值得為任務和目標犧牲的政治領導階層，就難怪軍人有時會對任務完全不在意。部署在阿富汗卡林哥山谷(Korengal Valley)的一名士官告訴筆者，到他結束部署前，他會刻意採取防衛姿態，用他能有的每個機會為安全而捨棄任務。這令人想起越戰後期一位軍官所說的話：「讓我們軍人在1966和1967年這麼有效率的「共同戰鬥」(gung-ho)態度，已被生存意志所取代。」這並非那些官兵缺乏勇氣，而是目標轉變了。我曾聽許多老兵們談及軍中時光，「我們為彼此而戰」，難怪！如果你的國家甚至不願提供將領建議成功所須之長期資源，那還要為它奮戰什麼？但如果你認為國家總是派你們去執行毫無意義，或全無可能的任務，而你只是被派去保護你的袍澤免遭危險，那麼想殺死你們的就不是塔利班、蓋達組織或伊斯蘭國了，而是美國自己。

作者簡介

Phil Klay係美陸戰隊退伍軍人，他以短篇小說集《重新部署》(*Redeployment*)贏得美國國家書卷獎。

Copyright © 2018, *The Atlantic*.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